

日本關西地區 「清代檔案史料研究會」介紹*

水越知**著
(伍躍***譯)

一、緣起

本清代檔案史料研究的活動始於 2016 年 7 月，但其源頭可追溯至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夫馬進主持的兩次科研經費研究會。夫馬進先生在主持 2006 至 2010 年間實施的日本學術振興會獎助研究項目——「中國訴訟社會史の研究」期間，購買了《巴縣檔案（同治朝）》的微縮膠片，並與研究會成員一同進行研讀。當時，該研究會成員除夫馬進先生之外，還有在日本國內的淺井正、岩井茂樹、大平祐一、谷井陽子、辻正博、寺田浩明、舩山明、伍躍等學者，同時邀請阿風、范金民、陳寶良、黃源盛、王志強等海外學者作為研究合作者參與。該個陣容非常恰當地映射出探索中國社會本質之一的「訴訟社會」的熱情。當時恭陪末座的筆者雖然不是正式成員，但依然能記憶猶新地回想起每一次充滿熱情的討論，以及在研究會結束後圍繞夫馬進先生長談的景象。除了作者之外，還有數名年輕研究者參與其中，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真正接觸清代地方檔案史料。值得一提的是，該研究會的成果被彙編成了夫馬進主編的《中國訴訟社會史の研究》一書中。毋庸諱言，該書中收錄的夫馬進先生所撰〈中國訴訟社會史概論〉一文已經成為該領域的必讀論文。¹

* 本文得到 JSPS 科研費 JP23K21976 的資助支援

** 關西學院大學文學部文化歷史學科教授

*** 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國際學部教授

1 詳見夫馬進，〈まえがき〉（前言），收於夫馬進編，《中國訴訟社會史の研究》

承蒙夫馬進先生惠允，我撰寫的論文被收入《中國訴訟社會史の研究》一書中，儘管當時我並未充分利用檔案史料，但在撰寫過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檔案史料的潛力。眾所週知，《巴縣檔案》中保存的地方衙門文書至少跨越 150 年以上，其數量在目前已知的中國地方檔案中雄踞首位。而且，這些檔案與重慶迅速發展成長江上游巨大都市的歷史時期相重疊，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審判的過程，可以探尋到生員胥吏，乃至源自一般百姓的「心聲」，毫無疑問地構成社會史和法制史資料的寶庫。2010 年，當夫馬進先生主持的研究課題結束後，希望繼續閱讀檔案史料的我拜訪了夫馬進先生的研究室，表達了想繼續閱讀和研究檔案史料的意願，夫馬進先生欣然同意。隨後，我們以私人讀書會的形式，從 2010 年 7 月開始，每月舉行一次檔案史料的會讀。這個讀書會聚集了除了我以外的小野達哉、増田知之、中西竜也、田邊章秀、凌鵬、海丹等人，以及參與夫馬進先生研究計劃的主要成員之一——伍躍。我們每星期六下午聚集在一間堆滿書籍和資料的私人研究室里閱讀檔案史料。剛開始時，由於知識的匱乏且不熟悉清代公文的體裁，我自己感到和學生時代上課時同樣的緊張。

夫馬進先生於 2013 年主持了題為「《巴縣檔案》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清代中國社會と訴訟・裁判——中國社會像の再検討」（以《巴縣檔案》為中心重新審視清代中國社會與訴訟、裁判——重探中國社會圖景）的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獎助課題，並組建了相關的研究會，前述許多讀書會的成員都轉入到該研究會中。同時，臼井佐知子、谷井陽子、寺田浩明等也以共同研究者身份參與其中。夫馬進先生借助《巴縣檔案》探討了訴訟的實態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通過對《巴縣檔案》的研讀，提高了與會者的文書解讀能力，而與會者也按照各自的問題意識從不同角度推進了研究。該研究會每月在京都大學和同志社大學舉行檔案史料的會讀。除了同治年間（1862-1874）的《巴縣檔案》外，該研究會還努力收集了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乾隆年間（1736-1795）的《巴縣檔

（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頁 i-vii。中譯：夫馬進，〈日文版序言〉，收於夫馬進編，范倫、趙晶等譯，《中國訴訟社會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頁 v-x。

案》，能夠從兩個歷史時期、即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的不同視角對重慶地區進行比較研究。該研究會的成果以「《巴縣檔案》に見る清代社會と地方行政」（《巴縣檔案》所見清代社會與地方行政）專刊的形式，發表在2015年12月刊行的東洋史研究會會刊《東洋史研究》第74卷3號中。²與此同時，以夫馬進先生為中心的《巴縣檔案》研究會也就此告一段落。

幾乎與此同時，我本人獲得研究經費的資助，在利用《巴縣檔案（同治朝）》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深感仍有許多史料未被利用，痛感集體研究的重要性，故而尋求繼續實施研究會的可能性。2016年，我與伍躍、小野達哉、凌鵬等人重新組成研究會，並將其命名為「巴縣檔案研究會」。研究會採用了與以往相似的讀書會形式，由負責會讀的人選擇感興趣的檔案史料，然後大家共同閱讀。研究會的成立得以實現，部分原因在於參與者相對自由地利用了昔日收集整理的《巴縣檔案》。夫馬進先生利用科研經費將《巴縣檔案（同治朝）》中的相當部分從微縮膠片覆制成書籍形式，以便研究者借閱使用。其次，隨著檔案史料研究的進展，人們開始思考從中可以解明中國社會的哪些問題。換言之，即使通過對《巴縣檔案（同治朝）》的分析可以詳細地觀察某些微觀事件，最終仍然只是適用於19世紀中葉重慶這一極其特殊地域的情況。對這一問題的思索成為了新研究會成立的動機。

最初參與者很少，每月僅在關西學院大學或大阪經濟法科大學等地進行活動，由於持之以恆，以致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逐漸增加了參與人數。隨後，不僅涉及《巴縣檔案》，還有《順天府檔案》、《淡新檔案》、《南部縣檔案》等其他清代檔案史料，並將研究會更名為「清代檔案史料研究會」，以便以更廣闊的視角展開研究。這可以說是前述夫馬進先生研究會致力於縱向理解理解中國的「訴訟社會」和對《巴縣檔案》進行精細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多種史料和社會比較的「面向」，在日本的中國地方檔案史料研究中開創了新的方向。為推動這項研究，從2022年開始，以該研究會為基礎申請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獎助課題「地方檔案史料による清代中國基層社會の構造研究—都市・農村の社會圈を中心に」（利用地方檔案史料研究清代中國基層社會的構造——以都市

2 詳見夫馬進，〈序言〉，《東洋史研究》74：3（京都，2015），頁1-2。

和農村的社會圈為中心)(2022-2027)，並組織了相應的課題組，堅持著檔案的閱讀與研究。

二、現狀

目前的研究會是有志者的結集，沒有明確的組織結構。但由於行政事務上的需要，由筆者擔任代表和幹事，負責安排日程、與參與者聯繫以及場地預定等工作。直至 2020 年 1 月，我們輪流利用關西學院大學和大阪經濟法科大學舉行活動。但在新冠疫情流行後，經歷了大約兩年的線上形式研究會，自 2022 年 4 月起轉為面對面和線上形式並行的混合模式。

該研究在 2016 年 7 月初創時只有幾個人，但最近每次會議大約 15 人左右參加。從 2022 年度開始的上述獎助課題組成員包括研究代表水越知（關西學院大學），以及研究分擔者伍躍（大阪經濟法科大學）、谷井陽子（天理大學）和鈴木秀光（京都大學）。³該四人外加上作為研究協力者的小野達哉（同志社大學），形成了清代檔案史料研究會的核心成員。其他參與者包括資深研究者，如臼井佐知子、井上徹等，中堅力量有赤城美恵子（中央大學）、石野一晴（清泉女子大學）、五味知子（慶應義塾大學）、土肥步（同志社大學）和望月直人（琉球大學），以及博士後研究員、研究生等新一代的研究者，其中包括許多來自中國、韓國等地的研究者和留學生。研究會當初成立時以研究生身分參與者已有人開始步入研究者的道路，我們自豪地認為研究會是年輕研究者培養的重要場所。此外，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聚集了歷史學和法學兩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彼此互異的視角為討論提供了豐富的刺激。當然，參與者的個別研究興趣也各不相同，通過匯聚這些興趣，我們能夠從多個角度綜合考察清代基層社會。

3 關於該獎助研究的活動與成果，請參看〈地方檔案史料による清代中國基層社會の構造研究—都市・農村的社會圈を中心に〉，「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データベース」，<https://kaken.nii.ac.jp/ja/grant/KAKENHI-PROJECT-22H00704>，2022.4.22，讀取 2024.3.18）。2022 年以後的活動也記載於其中。

研究會的活動主要分為兩個方面：（1）「史料會讀」和（2）「研究報告」。

在（1）「史料會讀」方面，自縮微膠卷印出的紙本《巴縣檔案》分別存放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和夫馬進先生家中。此外，微縮膠卷也存放在夫馬進先生家中，但相當部分尚未轉化成紙本或數位資料。除課題組成員之外，其他人難以利用《巴縣檔案》，故從 2022 年開始的課題組利用課題經費著手對這些微縮膠片進行數位化，並開始掃描紙質史料進行數位化。截至 2023 年 11 月，關西學院大學已經查閱完成數位化的 2,854 份《巴縣檔案（同治朝）》，主要分類包括「婦女」、「宗教」和「地權」等。這些資料的數位化可以補充京都大學文學部的收藏，提高了研究者的使用便利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西學院大學研究員張九龍和大阪大學博士生岡田悠希努力編製了目錄（包括對四川省檔案館目錄的修訂）。另外，課題組還利用課題經費購買了一套《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⁴，目前存放於關西學院大學圖書館。這樣，現在對清代四川的《巴縣檔案》和《南部縣檔案》兩個史料群的比較變得更加容易了。⁵《南部縣檔案》在規模上遜於《巴縣檔案》，存世年代主要是清朝末年，但作為中小地方衙門的檔案仍然是寶貴的史料。近年來，大陸地區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並陸續發表了若干專論。由於在日本難以利用該史料，故研究顯得相對低調。從這個意義上說，本研究會的活動對未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史料環境的完善為史料會讀提供了熟悉清代的法律術語、官方文書、方言和口語等各種複雜詞彙和文體的機會。包括年輕的研究者和研究生在內，即便是有一定閱讀能力的研究者也經常會遇到難以理解的部分。在遇到這種問題時，大家可以坦誠討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⁶除了詞彙和文體之外，關於文書樣式、文書流程以及司法程式

4 四川省南充市檔案局（館）編，《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308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

5 關西學院大學圖書館另藏有張晉藩總主編，《清代冕寧司法檔案全編》第 1 輯（35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閱覽四川地方檔案料較為方便。

6 《巴縣檔案》所見詞彙的成果之一是小野達哉，〈『巴縣檔案』輪讀會檢討語彙集〉，《東洋史研究》74：3（京都，2015），頁 235-248。

等制度性問題，僅僅從官箴書和判牘史料中可能並不能完全理解。在日本，滋賀秀三（1921-2008）的巨著《清代中國の法と裁判》是我們經常需要參考的文獻，但當前的史料分析可能已經超越了該書。

（2）研究報告主要由年輕的研究者們進行，臼井佐知子和井上徹等人也通過發表自身的研究成果向年輕一代傳授他們的研究經驗。這些報告主要關注明清社會史，也並不一定以檔案史料為中心，而是旨在廣泛分享在研究中有意運用檔案史料的課題。

以下是 2022 至 2023 年度的研究會的簡況：

2022 年

4 月 23 日：會讀《巴縣檔案（同治朝）》No.7866（水越知）

5 月 21 日：同上（水越知）

6 月 25 日：會讀〈為朱元才具控楊二千歲窩賊夥搶事〉（《清代晃寧司法檔案全編》）（鈴木秀光）

7 月 30 日：研究報告

（1）伍躍〈關於南京博物院藏太湖廳檔案第 2163 號的若干知見——長洲縣移為兼理吳縣用帳〉

（2）岡田悠希〈清代四川的移住開發與甘蔗栽培〉

9 月 24 日：研究報告

井上徹〈明代江南是否存在過宗族——解讀濱島敦俊的宗族論〉

10 月 22 日：Kim Hanbark《配流刑の時代》合評會

11 月 26 日：研究報告

海丹〈清代後期的塩業貿易與地方治理——以《巴縣檔案》為線索〉

12 月 24 日：研究報告

張九龍〈會館中祭祀的諸神〉

2023 年

1 月 21 日：會讀《巴縣檔案（乾隆朝）》No.245（小野達哉）

會讀《巴縣檔案（同治朝）》No.14620、14622（Kim Hanbark）

2月18日：會讀《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9-519（穆林）

史料解題《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水越知）

研究報告中涉及了移民、宗族、會館等明清社會史的重要主題，並與源自地方檔案史料的記述進行了比較和討論。用於研讀的地方檔案以《巴縣檔案》為主，但具體選擇依然是基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同時考慮到研究報告的內容。就2022年度而言，水越知選擇了寺院內僧侶間的糾紛、小野達哉選擇了藥物和鴉片的交易以及貨幣問題、Kim Hanbark選擇了對罪犯提供醫療服務等社會微觀方面的內容。此外，鈴木秀光從《冕寧縣檔案》、伍躍從《太湖庁檔案》、穆林從《南部縣檔案》中選擇了案件，並在關注與《巴縣檔案》的異同的基礎上進行了討論。2022年10月22日舉行了Kim Hanbark《配流刑の時代》⁷合評會，谷井陽子教授從歷史學的角度，赤城美惠子教授從法學角度進行的評論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穆林在本研究會上首次研讀並利用了《南部縣檔案》，其成果轉化為論文是令人欣喜的。⁸

三、展望

清代檔案史料研究會已經舉辦了超過70次的會議，若包括其前身——夫馬進先生主持的研究會，則已持續近20年，成為了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研究會。最初階段，在日本國內利用地方檔案史料進行研究尚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夫馬進先生高瞻遠矚，具有開拓之功。2016年以來，學者們已經深刻認識到地方檔案史料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新出檔案史料的發掘、研究人員以及研究論文的大幅增加等情況下，研究應如何進一步深化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然，積極促進與海外研究者的交流，在中國進行史料調查和實地考察無疑是必要的。然而，自新冠病毒感染症流行以來，使用上述方法進行研究的進展並不順利。研

7 キム・ハンバク（Kim Hanbark），《配流刑の時代 清朝と刑罰》（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22）。

8 穆林，〈清代後期の縣衙門による非正規の課徴——四川省南部縣の「取行應差」を例として——〉，《東洋史研究》82：3（京都，2023），頁1-35。

究的視角源自不同研究者的構築，作為研究者組織的研究會，未來應當如果推進研究的深入呢？

第一，地方檔案資料數量龐大，個人收集史料存在局限性。考慮到收集能力遠遜於當地研究者和研究機構，因此，若在日本進行中國地方檔案的研究，必須有研究團體的支援。通過彼此之間的互通有無，有可能提高研究的效率。幸運的是，正如前面介紹的那樣，本研究會的參加者分別從司法制度、官僚制、地方公共組織、城市和商業問題、家庭、女性和宗教等諸多角度出發展開研究，還涉及到《巴縣檔案》之外的地方檔案資料。有了這樣的研究平臺，可以聚集各類研究者和研究資訊。目前，依然不斷有新的研究者加入進來，我們也積極邀請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以便使研究會更加充實。研究會的參與者也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就 2022 年度而言，水越知發表了〈清代地方檔案史料の「虛構」と「事實」——史料論的考察——〉，伍躍發表了〈流品與冒捐冒考——以清代中期以後的“行政訴訟”案例為中心〉，鈴木秀光發表了〈私和から見る清代の刑事裁判制度〉等等。⁹

第二，雖然有點牧歌和情感色彩，但研究會作為培養研究人才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雖然有諸如讀書會、學習班等規模較小的研究會，但能讓一流研究者和年輕研究者平等地、跨代地共同討論的組織，實際上並不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的清代檔案史料研究會正在實現這一點，將老一輩研究者的經驗傳承下來，年輕一代的研究者也能與前輩們展開討論。包括筆者在內的中年學者，雖然在時間和工作上可能有些負擔，但我們都認識到辦好研究會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這一代從研究生時代起就通過參加各種讀書會受到了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和人文科學研究所等許多老師的指導，現在我們有必要為下一代提供機會。研究會中的年輕研究者們得以早期接觸檔案史料閱讀這一研究前沿，這對於他們作為研究者的基礎形成是有幫助的。而中堅以上的研究者們則

9 水越知，〈清代地方檔案史料の「虛構」と「事實」——史料論的考察——〉，《人文論究》72：4（西宮，2023），頁 63-85；伍躍，〈流品與冒捐冒考——以清代中期以後的“行政訴訟”案例為中心〉，《歷史教學》897（天津，2022），頁 16-27；鈴木秀光，〈私和から見る清代の刑事裁判制度〉，《中國史學》32（京都，2022），頁 137-154。

重視檔案史料閱讀作為回歸研究根基的重要途徑，不論與自己研究主題是否相關。具體成果方面，比如參與研究會的 Kim Hanbark 先生早期以《巴縣檔案》為主要材料撰就了關於清代刑罰問題的博士論文，鈴木秀光先生也表示通過深入研讀《巴縣檔案》，除了原本對《淡新檔案》的知識外，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拓展。¹⁰

最後，我曾在夫馬進先生介紹他在參加杭州的《龍泉司法檔案》讀書會的感想時說，共同研究班方式在中國並不常見，¹¹當時我頗感意外。雖然各國的研究者方法和思維方式各異是理所當然的，但在日本，自江戶時代以來，「讀書會」這種形式不論是漢學還是蘭學，都作為一種傳統深入人心，¹²這種優點是我們這一代也必須傳承的。

10 キム・ハンバク (Kim Hanbark)，《配流刑の時代》；鈴木秀光著，趙崧譯，〈清代“逐級審轉制”再考——清代裁判制度中的覆審制及其內涵〉，《法律史評論》2022：2（北京），頁 115-151。

11 夫馬進，〈『龍泉司法檔案』と龍泉司法檔案研讀會——とくに民國初年、教育界と商業界による警察糾弾案件をめぐる〉，《東方學》139（東京，2020），頁 91-100。

12 關於「讀書會」的歷史，可參見前田勉，《江戸の讀書會 會讀の思想史》（東京，平凡社，2012）。